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关键词〕 全球宗教复兴、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际关系理论

〔提要〕 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宗教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所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然而，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因此“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0)2 期 0044—06

〔完稿日期〕 2010年1月15日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1]（当代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动员的资源、全球范围重大政治冲突的资源、抗衡国家的资源以及国际政治的资源），^[2]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影响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大规模宗教复兴发生于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兰教以及民间宗教等，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

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带来并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和宗教散居社会、传教运动、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现象，大大改变了世界宗教格局并对现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为原则、以世界政治世俗化为支柱的国际关系体系提出了挑战。鉴于宗教复兴的全球趋势以及由此推动的将神明与特定文化、国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趋势，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对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3]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苏和发展，西方主导宗教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的北上互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4]如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结束了传教运动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称的“传教运动伟大世纪”（19世纪）后相对沉寂停滞的状况而进入所谓的“更伟大世纪”，而且还推动了基督教人口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转移。20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

女。^[5]而“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黑人将军白人士兵”、“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的新面孔”。^[6]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教的第三支力量,其在全球范围内信徒人数估计至少达2亿以上。依照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者戴维·马丁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旬节派的崛起“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端”。^[7]上述基督教新传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督教的重心南移,“基督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迅速成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8]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以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与新型媒体如广播和电视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特征,这便大大提高了宗教团体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同时也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信仰团体提供了发展空间,从而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事实上,网络的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与其他网络媒体一样,宗教网络作为信息的“简化器”或“放大器”,也造成和加剧负面宗教信息的流动和宗教领域的媒体、国际偏见,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他人人权状况或贬损他国国际形象的手段,在一些情况下更成为宗教恐怖主义的工作平台。^[9]

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从来就不是单独起作用

的。比如宗教与民族均具有跨国属性,宗教对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同的建构有着基础性作用。全球化造成国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各种宗教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互相渗透,彼此掺合,出现双重或多重身份认同问题,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移民接受国如英、法、德等国的传统宗教、民族融合模式造成巨大冲击。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把宗教与民族冲突带入西方世界的腹地,使“恐伊(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和处理当前东西方关系的棘手问题。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结合,更成为各种类型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跨国宗教与领土争端也有密切关系,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交错、宗教圣地归属主张的重叠、因宗教问题引起的邻国间的敌视等,都增加了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度,“国内宗教问题外溢”和“强国弱宗教”等现象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国内冲突往往呈现国际化趋势。尽管国内冲突国际化并不限于宗教,但宗教冲突因其跨国属性较易演变为国际冲突。目前宗教冲突或与宗教有关的冲突已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因。^[10]

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这首先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有学者曾归纳了宗教基要派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四种模式,即作为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创造者和摒弃者,来描述“强宗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11]或以五个“战”(fight)字(即fight back, fight for, fight with, fight against, fight under)来形容宗教基要主义激进好斗的基本特征;^[12]其次可指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就被普遍认为是近30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在左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

势；^[13]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14]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四次浪潮”^[15]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16]目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巨大威胁”。^[17]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平、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贡献。^[18]因此在学术界一方面有《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峙世俗国家》（1993年）^[19]、《圣战对麦当劳世界》（1995年）^[20]和《文明的冲突》（1996年）^[21]等论著力陈宗教冲突和认同政治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另一方面又有《宗教，遗失的治国术》（1994年）^[22]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2003年）^[23]等论著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宗教介入大大拓宽了当前国际事务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宗教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问题、国际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被作为

“遗失的治国术”而重新发掘。与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不同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新外交”，目前在世界上已逐步发展到可具体操作的程度。



总之，当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联系，完全可以用“颠覆性”来形容。然而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内，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大主流学派，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24]因此，笔者曾戏言国际关系学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25]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所引起的东欧剧变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亦轰然倒塌。“全球宗教复兴”、“世界的复魅”、“宗教跨国与国家式微”、“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宗教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冷战”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学术出版物，几乎完全取代了50年前曾风靡一时的“基督教王国衰退”、“上帝已死”、“后基督教甚至后宗教时代的来临”等话语而成为时代的标签，各种“非世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学界宗教研究的主流。

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目前在欧美，新闻媒体已对国际宗教问题日益关注，各高校争相开设宗教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

生课程, 举办关于该课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有关学术论著和博士论文也层出不穷。^[26] 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或“宗教反省”, 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 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科对经济因素的轻视, 而国际政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在对世界事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宗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忽略。^[27] 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能否完全“收编”宗教尚有争议, 宗教研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仍相当有限, 实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由宗教研究推动的“范式转移”更是遥遥无期, 但宗教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修正乃至革新显然已被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28]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西方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和分析虽有不同但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学界一般认为, 宗教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国际关系: 首先, 宗教观念和信仰通过影响决策者、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作用于外交政策, 这也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和制度的最重要的方式。第二, 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如“圣战”使战争行为合法化, 而当代“正义战争”观念和“人道主义干预论”也具有宗教和神学渊源。第三, “与国家有关的宗教行为体”和“非国家宗教行为体”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际事务, 与此同时, 某些宗教领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第四, 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建构的最主要方式之一, 在许多情况下, 宗教认同比种族、阶级和性别认同更为重要且涵盖面更广。第五, 宗教成为国际关系中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等“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之一。宗教价值观念和准则以不同方式影响国际舆论和制度, 而运用“软实力”也是宗教团体影响所在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

式之一。第六, 通过跨国、跨界宗教现象和运动, 如宗教冲突、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人口增长和堕胎等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作用于国际关系和安全。^[29] 对上述关联性, 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海恩斯指出, 国际宗教行为体一直被视为在国际政治中与影响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关键问题还扯不上边的“有趣现象”, “但如今不同宗教行为体不仅能直接影响国家的内政从而对国家权力有所牵制……而且也对国际关系有着意义重大的影响。”^[30]



在我国, 从 1949 年后到文革结束前的近 30 年时间内, 宗教学术研究基本陷于瘫痪局面。在只有宗教批判而无宗教研究的时代背景下, 意识形态化的宗教策论便占据了宗教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以来, 国内的宗教研究逐步复苏并呈现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清晰的学术转向。不过, 与其他学科如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领域相比, 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研究相对滞后, 甚至连对国际宗教问题较全面的介绍也是到本世纪初才陆续问世的, 并且还不都出自国际关系学者之手。在上述全球宗教复兴、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转向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研究趋热的影响下, 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已开始关注宗教与国际关系问题, 各种有关非传统安全以及宗教研究机构和项目应运而生,^[31] 宗教和文化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列入研究议程, 出现一系列有关论著。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国家战略和安全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 并且成为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有关部委和省市资助项目以及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在上述研究机构、项目和成果的推动下, 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讨论已进入学术化的新阶段。

目前国内学术化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 似具有以下特点及问题: 第一, “重文化轻宗教”, 宗教现象通常被作为文化之一部分来加以

讨论。这固然体现了国内宗教研究尤其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对滞后,也反映出国内学界在一般宗教研究问题上“乍暖还寒”、“下笔如有‘绳’”、“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第二,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32]尤其是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宗教冲突和民族宗教问题等特定议题的专门研究相对发达,这自然与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处境有关,不过在西方学界也有同样情况。对当前宗教作为安全威胁的关注,或宗教研究的新的“安全化”取向,亦有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降至“短、平、快”的时事报道和分析水准的隐忧。第三,尚存在宏观叙事和时事分析有余、实证和比较研究不足,宗教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外的其他学科较少介入,尚未建立较为完整的文献资料库和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架构等缺陷。一个学科或研究方向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其研究范式的建立与研究专著、项目的数量与质量。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成果甚少,且无标志性成果。^[33]第四,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动态不够掌握,缺乏对国外有关成果较为全面的介绍、翻译和批评机制,而这种机制目前在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已相当成熟。第五,宗教与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主要应是国际关系与宗教学两大学科的结合,而国内普遍存在着国际关系学者不通宗教,而宗教学者不谙国际关系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脱节现象,国际关系学与宗教学基本上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关系学和宗教学是目前国内两大热门学科。因此,就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学界除涉华课题外,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阶段,尚难与国际学界在此领域一争短长,尤其在跨宗教和宗教现象(如宗教与地区和暴力冲突)的数据处理、量化分析和实证考察等领域,但国内学界还是可以通过借鉴宗教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学科、采用局部性实证研究方法,立足中国宗教和国际关系现实开展研究,对该领域的学术发展做出有创新性的贡献。目前国内的宗教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均出现相互结合甚至相互转向的端倪。假以时日,我国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将会有长足的发展。

当然,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安全理论的介入,无疑是促进国内宗教与国际关系讨论深入开展和学术转向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指基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而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则泛指国际关系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就议题而言,上述领域还可有“主议题”与“共议题”之分。^[34]作此类区分有武断的成分,因为在具体研究中,这两类研究在方法、议题和目的上不仅密切相关而且互相借鉴,而笔者的主要研究主张就是两种研究路径之结合。但作此种区分却有助于了解国内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总的来说,狭义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无论在国内外都开展较晚,只是在20世纪末尤其是“9·11”事件以来,这种滞后局面才有所改观;广义的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在国内则开展较早且相对发达,这主要归功于神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外交学等学科的贡献。在西方,目前上述狭义和广义两类研究可说是平分秋色,许多有关论著为此两类研究的共同结晶。在我国,学界已有较好的世界宗教及西方神学、哲学研究基础,近年来不少学者尤其是宗教学者更是积极介入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讨论,^[35]而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问题从完全忽略发展到逐渐关注,上述两种研究也开始取得某种平衡。

鉴于上述情况,目前国内学界对宗教与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似更有赖于宗教研究在国际关系学或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虽不能完全包揽该领域的研究,但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只有完全融入国际关系/政治学科才能获得不可或缺且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尤其在上述“主议题”方面。宗教在当今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也要求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涉足宗教领域并对之做出回应。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是各种学科均可涉足的门槛较低的学科,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从目前国内外

研究现状来看,跨学科实证研究、国际关系学界的“宗教介入”以及超越描述性个案研究而建立宗教作为自变和因变量影响国际事务的理论框架应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学术转向的后续发展。

注 释:

[1]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7.

[2]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

[3]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6.

[4] 关于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研究,可参徐以骅:《国际视野、当地关怀——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载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6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

[5] 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6辑),第56—57页。

[6] 可参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以及 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可参 Robert Wuthnow, *Boundless Faith: the Global Outreach of American Church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7]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2008年,未正式发表,第5页。译文载于《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146页。

[8] 同注释[5],第70页。

[9] 可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3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

[10] 同注释[1],第63页。

[11] 宗教基要主义有广泛的世界性分布,由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资助的一项包括五部论著的关于全球宗教基要主义的项目,就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考察了全世界范围内75种不同的“强宗教”或宗教基要派运动。此五部著作由马蒂(Martin E. Marty)和阿普尔比(R. Scott Appleby)教授主编,于1991年至1995年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Gabriel A. Almond,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13]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38页,第44页。

[14] 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2008年。

[15] 学界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

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16] 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在“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 Elizabeth H. Prodronou, “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298.

[17] Douglas Johnston, “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 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5.

[18] 比如世界性的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十分积极的作用。可参《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时事出版社,2009年。

[19]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0]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21] 见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22] Douglas Johns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 上引 Douglas Johns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24]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The Return from Exile: An Introduction,” i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该书有张新樟等题名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的中译本,2009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5]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第4辑),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26] 目前西方推出的宗教与国际关系/政治的系列丛书主要有两套:其一是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推出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宗教系列丛书”;其二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剑桥社会理论、宗教与政治研究系列丛书”。

[27] Vendulka Kubalkova,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 in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pp.79-105.

[28] 英文世界有关宗教与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可参 Eva Bellin, “Faith in Politics,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World Politics*, Vol. 60, No. 2 (Jan. 2008), pp.315-347.

[29]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163-168; Scott Thomas,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0), pp.4-14;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59-67;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第17-20页;徐以骅、刘霁:《宗教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下转第61页)

欧盟也步美国后尘,加紧向中亚渗透,着重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影响中亚国家,甚至有将中亚纳入欧盟势力圈的意向。这在中国的负面效应和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社会层面。苏联解体后,中亚局势持续动荡,各大国和地区力量在中亚的竞争、角逐,加剧了中亚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美欧为了把中亚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大力影响该地区国家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同时,利用金钱收买和支持为手段,大力培植亲美欧势力,扶植不听命的中亚国家的反政府组织,策动“颜色革命”,以使中亚国家“格鲁吉亚化”,更是该地区的乱源祸始。其策动“颜色革命”的阴谋虽未能得逞,但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图谋和努力,这是中亚地区最大的潜在动乱之源。这对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一种现实与潜在的挑战。与此同时,在中亚地区“三股势力”活动猖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沉渣泛起,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都借助中亚国家与中国边界两端千丝万缕的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的联系,迅速向中国西北边疆蔓延,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陆上边界最为麻烦和脆弱的环节。特别是集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于一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恐怖和民族分裂组织把中亚作为对中国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前沿阵地,一再在中国新疆制造恐怖流血事件,对中国西部有关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再次,在经济层面。中亚虽然得天独厚,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和油气资源,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在多个大国竞相觊觎和争夺下,这些资源就显得供不应求。这无疑将影响中国从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的进口。

尽管如此,中亚地缘战略形势对中国来说机遇是主要的。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更是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中亚的繁荣稳定有赖于中国,中国的持续发展和西部边疆的稳定有赖于中亚。中国与中亚国家一定能够抓住机遇,深化合作,开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注 释:

[1] 杨恕:《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231页。

[2]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3] Fact Shee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Nov. 12, 2002.

[4] 赵青海:《欧盟新中亚战略评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第40页。

[5] Richard A. Boucher, “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Balancing Priorities”, Statement to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pril 26, 2006, <http://www.state.gov/p/sca/rls/rm/2006/65292.html>.

[6] European Community, “Regional Strategy paper for assistance to central Asia for the period 2007–2013”.

[7] 新浪新闻中心 2010年1月25日国际在线消息。

[8] 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

(上接第49页)(200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页。

[30]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7), pp.44–45.

[31] 其中包括成立于2004年5月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目前该中心已推出多部研究专著的《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其中包括涂怡超:《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葛培理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2] 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提法不够严谨,这是因为“宗教极端主义”并不一定是暴力性的,如宗教学者周燮藩所言,长期以来宗教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禁欲苦行而不是恐怖主义”。(见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事实上“宗教极端主义”还可指有些宗教组织如公谊会(资格会)所举行的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想和实践。因此,准确地提法应

是“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

[33] 对包括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等国内各大学术网站的检索显示即使从国际关系视角讨论国际宗教问题的学术论文也为数甚少。

[34] 在上述领域国际关系学的“主议题”包括宗教与当代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家/国际安全、各国外交、地缘政治等;其他学科有充分介入甚至作为主导的“共议题”包括宗教与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全球化、国际法、国际冲突和对话等议题。

[35] 其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上引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卓新平主编:《当代基督教教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宗教》,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第1~15页;金宜久:《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17~22页,以及张志刚:《宗教与国际热点问题——宗教因素对冷战后国际热点问题和重大冲突的深层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42~54页等。